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历史进程

■ 欧阳宏生 唐希牧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历史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究对曾经在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事件与成果进行了新的挖掘与整理, 以此分析了不同阶段的特色, 论述了各个阶段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具体内容与价值取向, 并就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以期为我国广播电视研究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广播电视; 学术研究; 历史进程

2018 年, 正值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 广播电视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 其研究的规模、质量和层次不断提升, 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跨界、多方法融合的繁荣景象。可以说, 改革开放的 40 年也是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发展最快的时期。“明镜可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没有对学科历史的清理, 我们便无法在现实的语境中去还原与把握研究对象, 也就无法进一步推进整个学科向前发展。面对不断活跃着的行业实践, 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应该有怎样的追求? 怎样的目标? 如何在既有的基础上再出发? 凡此种种问题, 均需我们予以深思。因此,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让我们以一种新的问题意识、新的思想姿态、新的理论眼光, 对广播电视学术研究所走过的这段历史进行一番深入且具有建构意义的总结与反思, 无疑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国自 1923 年诞生广播, 1958 年出现电视, 人们对其的认识也由此展开。这种认识既是一种探索和发现的过程, 也是一种形成知识系统的研究过程。^①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变迁而变迁, 但架构学科结构的理论体系和引领科学发展的思维逻辑仍保持了相对的统一。在这个模式下, 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便有着贯穿今昔的线索意义。以此为基点, 观照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广播电视研究的发展历程, 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学术研究的探索期、学科意识的觉醒期、学科独立与成型期以及学科的多元与繁荣期这四个阶段。下面将分别对这四个阶段作简要的梳理。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限于篇幅的原因, 本文未能穷尽各阶段所有的研究内容, 仅选取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事件与成果进行阐释, 以求达到“窥

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此外, 本文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一、学术研究的探索期(1978 - 1982)

在历史时间轴上第一处涤荡社会积久诟病的节点处, 是由思想解放所散发出的光辉牵引社会的变革, 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作为吹响新时代的号角。1976 年 10 月, 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国内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并没有立竿见影地回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会议确立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 才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保障和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 广播电视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端正指导思想的反思阶段, 对广播电视本体理论的探讨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其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积极探索“自己走路”

关于广播电视“自己走路”并不是这一时期新提出的口号,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就提出“广播电视要学会自己走路”。据中央台原台长左漠野回忆: “当时的新闻总署为广播规定了三个任务: 一是发布新闻, 传达政令; 二是社会教育; 三是文化娱乐。继而胡乔木同志向我们提出: 你们要自己走路。意思是说, 广播不能完全依靠报纸和通讯社, 自己应当采、编、写一些东西。”^②在此背景下, 广播电视开始了第一次蹒跚学步, 并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取得了初步成绩。然而, 这一方针的贯彻却在“文革”中被迫中断, 广播电视又重新沦为了报纸的“有声版”与“传声筒”。直到 1980 年 10 月, 在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 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在其报告中重新提出“自己走路”的方针, 并且就方

针的贯彻提出了七条重要的措施。于是,广播电视又一次迈出了“自己走路”的新步伐。

然而,两次方针的提出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历时意义。50年代提出“自己走路”主要是为了克服广播对报纸与通讯社的依赖,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记者、编辑和节目制作队伍。^③而80年代重提,广播电视的队伍已经壮大,设备不断完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此时的“自己走路”不仅意味着广播电视已彻底摆脱了报纸这种以文字为主的信息传播方式,走上了一条尊重自身传播规律的发展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它解放了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思想,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广播电视实践的创造力。从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到之后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召开,短短两年时间里,广播电视“自己走路”便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绩:第一,电台、电视台以“短、快、新”为特点的新闻明显增多;第二,广播评论重新上马,电视评论初现荧屏;第三,主持人节目开始出现;第四,远距离教育的发展;第五,电视剧开始复苏。^④而这些均为我国广播电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对广播电视特点和原理的深入探讨

正是在“自己走路”这一号召下,80年代初,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广播电视特点的本体论讨论热潮,其目的是对广播电视界的一些基本问题加以廓清。据统计,在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间,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采编”上就发表了有关广播电视本体理论的文章共20篇。^⑤这20篇文章涉及了广播电视的特点、性质、传播的职能与范围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广播研究方面,白谦诚首先从“广播特点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本源出发,认为“广播的特点是由无线电波传送声音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所决定的,因而广播兼有无线电和声音两方面的特点。”据此他进一步指出,广播具有“依靠声音、对象广泛、迅速及时、没有距离”这四个特点。^⑥然而对这一论断,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其中,春犁认为,“传播方式不等于广播特点”。虽然“传播方式决定广播特点”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要科学地表述广播特点,需要有明确的标准,即“所谓特点,应该既包括优点,也包括缺点,它是相比较存在的。”进而作者提出广播的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优点和缺点两部分:(一)广播依靠电波传播声音,因而具有迅速及时、感染力强、对象广泛、传输方便的长处;(二)广播依靠电波传播声音,同时存在着稍纵即逝、不便选择、语言限制、不易保密的短处。^⑦而学者章宗栋则是根据“特点”这一词的含义,即“一事物与他事物相比,此事物有而他事物无的地方”,对白谦诚的“四特点说”

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广播的特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仅仅用声音来传播内容”。^⑧在电视研究方面,张凤铸的《电视新闻的力量在于真实》和叶家铮的《谈电视特性兼谈电视新闻》《以电视传播的特性谈新闻之‘新’》,这三篇文章则分别从新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电视传播的特性出发,认为电视“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屏幕形式展示连续运动及富于变化的图像和声音,极其迅速地向广大家庭传播各种特定的内容(节目)。它是最大众化、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传播媒介。”^⑨而电视新闻则是“‘没有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是‘形象化的政论’。它通过可视形象来表现现实生活,表达人民的思想情感,最迅速、最直接地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⑩

从以上对广播电视特点的分析与辩驳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研究虽处于一个比较宏观的层次,但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化,研究者们逐渐革除了以往那种被特殊政治文化所制约、所扭曲而形成的唯上、唯书的思维传统,重构根植于新闻传播实践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主体意识和学术理性。^⑪

3. 对广播电视“工具论”的批判与反思

批判与反思是为了除旧,是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呼应。然而,早期的广播电视学术研究是以传统新闻学^⑫为基础的,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属性。因此,对广播电视“工具论”的批判最早是从新闻学界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⑬的批判开始的。1980年,在《新闻研究资料》第3辑《新闻研究》专题下,学者们针对这一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讨论的结果是引发了两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阶级斗争工具”即为新闻事业的本质属性。所以,“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报纸、广播仍是阶级斗争或阶级专政的工具”^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事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新闻事业的一种作用,不是其本质属性^⑮,其本质属性是新闻性。因而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报纸是新闻传播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又是阶级的舆论工具。”^⑯从以上两种观点所各自依持的论据来看,其主要的分歧在于报纸是因为什么需要而产生的。纵观整个中外新闻发展史,将报纸归结于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说法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其所支撑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在新闻学界这种自我反思与批判浪潮的影响下,广播电视界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81年,郭镇之在《评“阶级斗争工

具’说》一文中指出阶级斗争工具的提法含义太狭窄,他认为广播电视最主要的特征应该是迅速广泛地传播消息,而这种传播性才是新闻媒介区别于其它的根本属性。^⑦1983年,时任广电部顾问的卢克勤则是从信息这一概念出发,通过对广播电视在沟通消息渠道、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供文化娱乐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功能的梳理与考察,进而将广播电视定位于一种“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⑧这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过去几十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工具论,同时也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与范围。

总体而言,此次关于广播电视性质的讨论具有着双重历史意义: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之后,虽然学界对广播电视的性质并未达成一致,但坚持“阶级斗争工具论”的人少了,而对广播电视是新闻传播和社会舆论工具之类的观点有了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讨论本身给中国的广播电视学者提供了一个怀疑甚至是颠覆政治权威强加于广播电视研究现状的话语机会,此后,广播电视学术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学科意识的觉醒期(1983-1991)

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此次会议不仅确立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广播电视宣传改革”的工作目标,同时还提出了广播电视“坚持自己走路,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业务方针以及“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发展方针。^⑩在此背景下,全国的广播电视媒体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闻改革。然而,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这种客观要求成为了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动力。因此,这一阶段的广播电视研究不仅非常活跃,而且突破了新闻学的框架,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学科意识。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的建立

这一时期,随着广播电视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也开始相继建立。在研究机构方面,从1986年10月起,广播电视部开始承担系统内协调、指导各研究单位业务工作的管理职能。在此之前,其系统内部只有一个负责搜集、翻译、编印外国广播电视情报资料的研究机构,即国际台研究室。此后,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及全国各地广播电视厅(局)也陆续成立了研究室。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6年5月,广播电视系统的研究机构就发展到了15家。^⑪在研究团体方面,1986年10月15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以下

简称中广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学会以开展广电的学术研究,提高广电工作者的素质,提高广电节目质量,促进中国广播学、电视学的建设和发展为宗旨,主要任务是:研究广播电视理论与历史,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广播学、电视学;开展广播事业的调查研究,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利条件等。^⑫随着学会各项工作的展开,广播电视学术研究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分散的个体研究状态,形成了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并举的新局面,其研究的问题与范畴也由以往侧重对微观业务与工作经验的介绍转向对带有全局性、系统性等宏观问题的思考。同时,围绕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这一总体目标,从1986年至1991年,学会曾组织了近百次相关的经验交流会与学术研讨会。在1988年和1990年,学会还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以及1990年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活动,其中评选出的不少论文与著作均填补了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多项理论空白。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3月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与中广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还首次将学界与业界的研究者们汇集在了一起。针对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会议共制定了1992年至1995年全国广播电视研究课题115个,其中重点研究课题22个。^⑬这些课题被下达达到全国各大广电研究系统,一时间,积极申报课题、踊跃承担课题成为了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各类刊物的创办与学术论文的涌现

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全国各级电视媒体、电视教育部门也纷纷成立广播电视分会,分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阵地的建设,广播电视刊物迎来了创办热潮。1979年创刊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更名为《现代传播》)以学术性、专业性为追求,是我国广播电视研究重要的专业性期刊。1982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成立并创办了《电视文艺》,后定名为《中国电视》,主要刊登电视文艺,特别是电视剧、综艺节目的研究论文。1984年10月,由广播电视部主办的,以广大电视工作者为对象的《广播电视战线》创刊,其主要任务是以宣传工作为中心,开展经验交流与业务研究,从而提高节目质量、开创广播电视宣传工作新局面服务^⑭。1985年3月,中央电视台内部刊物《电视业务》(1989年更名为《电视研究》)试刊出版,1988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学研究委员会成立,并决定将其作为全国电视学研究委

员会的会刊,其宗旨是传播电视新理念,探讨电视业务。1988年2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该刊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决策理论研究并重的方针,既保持了较高层次的学术理性,又增强了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②。此外,陆续创办的刊物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中国广播》、浙江省的《视听纵横》、江苏省的《视听界》、广东省的《岭南视听研究》以及江西省的《声屏世界》等。据统计,此间全国广播电视的相关研究刊物总计达64种^③。

这些刊物的创办不仅为广播电视研究开辟了新的阵地与交流平台,而且凝聚起了一大批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人员。借助这些平台,大量的学术成果开始涌现,广播电视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在理论研究方面,随着西方传播学的引入,过去对广播电视性质、功能等概念表述的不够完整与确切等问题被再次提出讨论。如刘志筠的《我对广播电视性质的思考》、甘惜分的《广播电视,姓甚名谁》、白谦诚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和职能》等,均对广播电视的一些基本问题与原理作了进一步阐释与分析。在业务研究方面,1986年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改革在业界引起了轰动,“珠江模式”也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像曹璐的《深化广播改革的新视野——从珠江经济台的节目改革谈起》、罗弘道的《从‘机关型’到‘大众型’——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改革之路》、李东的《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听众参与”的思想与实践》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广播的这一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思考。同时,这一时期随着电视的普及,其影响力逐渐超越报纸广播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媒介”,与之相对应的电视研究也有大批的成果问世。如田本相的《论电视文化的结构》、刘建宏的《中国电视市场的机会和构成》、胡智锋的《十年来中国电视发展历程的一种描述》等。

3. 对广播电视作为独立学科体系的理论探讨

一般而言,衡量一个学科是否独立应具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第二,是否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第三,是否能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④如果以此为尺度,那么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随着广播电视理论成果的日趋丰富,广播电视研究已逐渐突破了新闻学的框架,其独立的学科建设也逐渐被提上议程。这一时期,对广播电视学科体系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于对广播电视内部体系的完善与建构上,如左漠野的系列文章《广播电视有学》《人们需要广播学、电视学》《关于建设广播学、电视学的一些想法——在中国广播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上

的讲话》《建设广播电视学构想——写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的时候》,温济泽的《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以及白谦诚的《广播电视事业和广播电视学》等文章,都集中探讨了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可能性、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最早把广播电视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则始于1986年7月,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在庐山召开的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这次会议把广播与电视作为独立的学科,从宏观上、总体上进行了综合研究。^⑤同年10月,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大会上,温济泽在大会发言中建议将广电研究从新闻学的框架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广播电视学。该提议被当作学会的首要任务,这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学、电视学已由少数人的倡导变成了全系统的共识。

同时,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这一总体目标,此期间,大量基础理论著作开始涌现,如刘志筠编写的《电子新闻媒介——广播与电视》、施天权的《广播电视概论》、田本相的《电视文化学》、王珏的《新闻广播电视概论》、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吴信训的《实用电视传播学》等。其中,由闫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是这一时期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专著和广播电视学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汇聚了全国广电系统内26位专家、学者,在反复研究讨论的基础上,用了四年的时间才集集成册。全书共计63.3万字,共有8编40章,其主要内容涉及广播电视节目系统、节目要素、节目生产流程、节目传播、传播者与受众、立法与管理等多个方面。此外,在史论与工具书方面还有北京广播学院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赵玉明的《广播电视简明辞典》《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以及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等。

三、学科的独立与成型期(1992-2000)

1992年11月,在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体系中,广播电视学作为独立学科被写进《学科分类与代码》,隶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成为正式的二级学科。^⑥由此,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地位得到社会认同,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时期。其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争鸣意识与创新意识的增强

广播电视事业改革的发展必然带来新旧观念的碰撞,在学术上的突出反映就是学术争鸣。该阶段,争鸣主要是围绕广播电视的本质与创作两个方面进行的。在广播电视本质方面,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地将广播电视纳入第三产业。在这一政策的引领下,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被完全推向了市场。然而,实践的发展却遭到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受长期以来形成的广播电视事业属于上层建筑,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和人民喉舌等固有观念的影响,此时人们对广播电视能否走向市场还充满了疑惑,这直接导致了广播电视事业改革的举步不前。在此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媒体是否具有商品属性”的大讨论。通过讨论,大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众传媒,中国广播电视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②由此,广播电视的双重属性得以正式确立。另外,关于广播电视文化品格品味的问题也成为了这一时期学者们争鸣的对象。通过争鸣,大家从理论上廓清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广播电视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了优秀文化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广播电视创作方面,对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研讨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90年代初,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学研究委员会就对电视新闻的类型问题进行了研讨,经过三年的探索与研究,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结合大量的电视新闻事件,阐述了电视新闻的分类与意义,列出了70多个关于电视新闻的词条,最终对电视新闻的分类与界定达成了统一的认识。此外,整个90年代,学界还对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广播电视栏目改版、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电视剧美学等都展开过深入的讨论。

2. 理论研究与业务实践的有机结合

进入90年代后,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改革热潮为我国广播电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应地,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也重新步入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性发展轨道。一方面,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被用来指导我国广播电视实践,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当时就有学者借鉴西方纪录电影的理论,论述了其对中国电视的启示:“对于中国电视人来说,学习西方记录电影,应在‘直接电影’上再进一步,变‘纯记录’为‘真实的片段记录’,把等拍、抢拍与挑拍结合起来,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电视人,电影自有其独特的传播与接收的规律,电视节目在‘这一刻’播出的内容是可以有头没有尾或没头没尾的。”^③同时,作者对一系列拍摄方法的专业性阐述更加密切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诸如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专题、广播电视文艺等应用层面的学术成果也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起来。1996年出版的

《十评飞天奖》便是这一时期关于电视剧研究的代表著作。该书由长期担任电视剧奖项评委的仲呈祥撰写,其内容均是作者在长期的评奖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电视剧创作的独到见解。该书出版后,其中的许多具有创建性意义的观点还被当时的电视剧创作者广泛采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进入市场经济后,各媒体间开始有了激烈的竞争,于是受众满意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为满足受众需要,各大媒体不断进行改版工作,调整自身定位与节目内容。此时的广播电视受众研究也在这一倾向的带动下逐渐从早期对受众接触媒体的外显行为的调查,转为对媒体信息传播与受众内在思想观念的关联的研究。例如,张克旭等人的《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一文便是运用全新理论与方法研究广播电视受众问题的典范。

3. 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日趋完善

该阶段,广播电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其突出地表现在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上。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体系的形成。1998年,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研究”立项^④,《中国电视论纲》则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成果。围绕此书的内容,1998年11月,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还联合举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暨《中国电视论纲》研讨会”。会上,沈宝祥、郑兴东、赵立凡、王甫、郭镇之、童兵、欧阳宏生等20多名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高度评价了该书在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作出的突出贡献。^⑤同时,不少学者也对此成果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例如,陈力丹教授就从电视的属性、功能、产业、管理、未来发展以及学科构建等几个方面全面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电视论纲》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⑥此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过程中,除《中国电视论纲》这一重大成果外,如北京广播学院的《中国应用电视学》、涂光晋的《广播电视评论学》、叶家铮的《电视媒介研究》、张雅欣的《电视概论》、黄匡宇的《理论电视新闻学》、张君昌的《实用电视新闻学》、刘忻的《电视重构论》、陆晔的《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李岩的《广播导论》等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第二,广播电视经济学成为研究热点。这一时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广播电视双重属性的确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开始渗透进广播电视之中,为广播电视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96年,北京广播学院设立了我国第一家研究传媒经济理论与应用的机构——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周鸿铎是我国研究广播电视经

济理论最早的学者。其所著的《广播电视经济学》一书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同时,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则是较早在我国提出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理论的著作。此外,对广播电视经济学的理论探索还多见于各类学术会议与业务交流的文集中。由喻万祥主编的《首届广播电影电视经济管理研讨会文集》一书是我国首届广播影视经济管理研讨会的重要成果,该书收录了多篇有关广播电视经济研究的理论佳作,这些都为今后广播电视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广播电视艺术学是艺术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艺术与电子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兴学科。1990年代,在原有基础上构建并发展起来的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对此,作为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化重要开拓者之一的胡智锋教授将其概括为“两种路径,多元格局”^③,所谓两种路径是指由于学术背景、学术理念、学术风格的差异,从事广播电视艺术的学科建设和专业研究所呈现出的两种有代表性的思路、取向和方式,它们分别以北京广播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为代表。依托这两种路径,多年来,以黄会林的《艺苑论谭——放言影视戏剧艺术民族化》、周星的《中国影视艺术研究》、胡智锋的《电视美的探寻》、高鑫的《电视艺术学》、张凤铸的《电视声画艺术》以及曾庆瑞的《电视剧原理》等为代表,形成了中国广播电视艺术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这些成果不仅指导了广播电视艺术的创作实践,同时也推动了广播电视理论的发展。

总体而言,在改革中发现问题,在探讨中提升理论与业务水平,从而建构起独立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体系,这一时期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最大特色便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探索,再到实践中进行检验和升华。尽管这一阶段广播电视改革的步伐有快有慢,但不可否认,这个边摸索、边建设、边实践、边总结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对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还是对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而言,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历程。

四、学科的多元与繁荣期(2001-2018)

进入21世纪,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广播电视原有的生态格局被打破,媒体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媒介融合成为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20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正式将“广播电视新闻学”调整为“广播电视学”,这是国家主管部门首次为广播电视学正名^④,旨在发挥广播电视自身的

学科优势,以便更好地应对来自新媒体的冲击。此后,广播电视研究开始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其研究主体更加成熟多样、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尤其对于交叉学科和理论的借鉴和吸取,不断深化和丰富着广播电视研究的内涵。

1. 强化组织建设,学术队伍壮大,主体身份多样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空前繁荣。在组织建设方面,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每年有关广播电视的选题占了一定比例。国家广电总局每年围绕行业发展发布40个左右的部级科研课题。同时,为了适应发展,我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会整合了我国广播电影电视业界和学界的学术资源,下属24个国家一级协(学)会,56个二级分会和专业委员会,搭建了“学术研究、创新引领”等一系列学术平台,每年围绕广播电视热点难点问题,发布研究选题。2001年,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党组的指示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组织开展了“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的评选活动,一批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做出贡献的理论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以后这一活动每隔四年评选一届,该举措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界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热情。

广播电视组织建设的强化,使得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800多所院校办有广播电视专业,约有3万多名从事广播电视教育和研究的人员,全国业界的研究人员也有近万名,总计有4万人左右。在主体结构分布上,以广播电视管理部门、高等院校和广播电视媒体为主的三支学术队伍分别凝聚起了不同的研究群体,并日益形成稳定的研究风格。如以管理部门为代表的研究群体,汇集了来自行业管理结构和媒体单位的领导成员。这一群体常以政策决策、行业建设、管理探索等为内容,对带动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在沟通政府、媒体机构与市场运营实体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以高校为代表凝聚起来的广播电视研究主体,则在广播电视本体理论的建构,史学研究、文化事业的呈现以及学科体系的建设方面发挥出独一无二的作用。以广播电视媒体单位为核心形成的研究群体,则是业务研究领域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这一群体以媒体一线的从业者为主,是我国广播电视应用研究的主要力量,其视角和看法往往紧扣行业的诉求,更多地是从行业动态、人文艺术的角度出发来审视整个行业。诸如媒介融合、新媒体经营管理、电视剧研究等,在这部分群体的

文章中都能得到快速回应。此外,网络的兴起催生了一批特殊的广播电视研究群体。这些隐匿于网络世界背后的研究主体,职业背景多元,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职业训练,但却有着广泛的社会阅历和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往往能从旁逸斜出的角度对行业的发展提出独到的见解。

2. 研究格局基本形成,研究成果丰硕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进一步细化,基本形成了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广播电视应用理论、广播电视决策理论和广播电视史论的研究格局。在基础理论方面,学者们对有关广播电视与政治、社会、经济、法律、伦理道德等外部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广播电视传播理论、美学理论、批判理论以及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文艺等内部关系上也出现了大批成果,如胡智锋的《中国电视观念论》、陈富清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广播电视业》、时统宇的《电视批判理论研究》、张骏德的《当代广播电视新闻学》、谭天和王甫的《电视策划学》、周小普的《广播新闻与音响报道》、尹鸿的《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欧阳宏生的《电视文化学》、覃信刚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广播编排》、李欣的《类型化广播的中国发展道路》、王宇的《广播报道与危机应对》等。其中,由张振华主编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是这一时期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著作吸收了 21 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理论研究的当代性;在决策理论方面,随着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相关政策的出台,我国广播事业整体呈现出向产业化转向的发展轨迹。在此过程中,诸如制播分离、三网融合、集团化试水、资本运营等词汇,成为了这一时期决策研究的重点。围绕这些重点,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如胡正荣的《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黄升民的《广电媒介产业经营新论》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应用理论方面,在 21 世纪的头几年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并未在我国真正地普及开来。因此这一阶段的应用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广播电视改革自身的理论探索,例如围绕广播电视经营管理,进行了有关体制改革的研究;围绕广播电视技术发展,进行了广播电视数字化的研究;围绕广播电视节目质量,进行了频道专业化、品牌化、精品化的研究;围绕广播电视文化,进行了平民化、娱乐化的研究。^③此外,对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的生产、管理及创作规律等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且取得了诸多突破性的成果。然而,由于新媒体对广播电视的影响日渐突出,仅靠广播电视自身改革已难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因此,媒介融合成为了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研究也开始逐渐转移到对媒介融合的思考与阐发上来,“互联网+”“中央厨房”模式、大数据等研究热潮便是这一倾向的集中体现。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以来我国公开出版的有关媒介融合的著作约 20 部左右,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300 余篇。而在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方面,一方面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对广播电视通史、思想史、事业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像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刘习良的《中国电视史》、徐光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申启武的《中国广播研究 90 年》、常江的《中国电视史: 1958 - 2008》等均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除围绕中国广播电视史这个中心外,外国广播电视史、学术史、批判史、教育史等也成为了该阶段史学研究的亮点。如郭镇之的《中外广播电视史》、陈尔泰的《中国广播史考》、欧阳宏生的《中国电视批判史》、陈志昂的《电视艺术通史》、王文利的《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史稿(1920 - 2011)》、赵玉明和艾红红的《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等都填补了我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多项空白。

3. 研究视野愈加开阔,研究方法多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使观点活跃起来并传播出去,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必须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推理论证。其中,实证研究是广播电视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研究结果最为客观的一种研究方法。该方法旨在揭示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及因素间的普遍联系,归纳概括现象的本质和运行规律^④,从而使得大量广播电视实践在理论中得到升华。此外,解释研究和思辨研究也在广播电视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浪潮的兴起使得不少其他领域的学者开始将自身学科的诸多研究方法涉入到广播电视领域,极大地拓宽了广播电视研究的视野范围。其实,早在广播电视学诞生之初就受到了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信息学等学科形式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也在很长时间内沿用与继承着这些学科,如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心理学中的实验认知、政治学中的论述分类、信息学中的信息分析等等。而近年来在研究中大量兴起的数据统计、模式研究、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也都受到了诸如统计学、逻辑学、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的影响。其实,无论上述哪种研究方法,在实际的运用当中是很难泾渭分明的。但这种方法之间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现象恰恰反映出广播电视研究正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研究方法的多元与融合使得

学科之间的沟壑被填平,学科间的交流和兼容也日益扩大,从而逐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与资源整合。

沿着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发展足迹,我们简要回顾了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管窥中可以看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经过几代广电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上日益完善并形成了相当规模。其研究主体多样,逐渐从感性认识走向了理性的思辨;研究内容丰富,从以往更加重视业务实践的研究转向了对广播电视多个向度的探索;研究视野开

阔,日益走向多维与多元,并且在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它自身的延续性,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只有经常地展望和前瞻,才能更加清晰地认清历史。如今,我们已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进步正起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作用,而这同样也对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上述这些问题来看,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注释:

- ① 赵玉明、艾红红、庞亮主编《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 ② 左漠野《自己走路 发挥优势》,《新闻战线》,1980年第11期。
- ③ 周华斌《广播电视文艺沉思录》,《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
- ④⑤ 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357、1页。
- ⑥ 杨靖、陈思劼《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20年》,《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
- ⑦ 白谦诚《广播特点初探》,《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 ⑧ 春犁《漫谈广播特点》,《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 ⑨ 章宗栋《“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已经不是广播的特点》,《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 ⑩ 叶家铮《以电视传播的特性谈新闻之“新”》,《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 ⑪ 张凤铸《电视新闻的力量在于真实》,《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 ⑫ 李向阳《解放思想与我国当代新闻传播理念的嬗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
- ⑬ 本文所谓“传统新闻学”特指1978年传播学引入之前的新闻学。这一时期的新闻学主要是以报刊等印刷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历史三板块研究的新闻学体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又可分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
- ⑭ 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说法最早由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1930年8月15日的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提出。1949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街坊城市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提法确定下来。到了“文革”期间,该观点进一步演变为“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仅成为“四人帮”操纵中国新闻业的有力武器,还被写入“文革”时期的新闻学教材之中。
- ⑮ 康荫《新闻工作性质初探》,《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辑。
- ⑯ 甘惜分《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辑。
- ⑰ 徐培汀、谭启泰《试论报纸的性质》,《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辑。
- ⑱ 郭镇之《评“阶级斗争工具”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 ⑲ 卢克勤《广播电视——强大的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广播与电视技术》,1983年第5期。
- ⑳ 王文利《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史稿(1920-2011)》,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 ㉑ 罗弘道《改革开放十三年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5期。
- ㉒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编辑部《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1984-1995)》,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 ㉓ 参见何光《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新起点》,《现代传播》,1993年第1期。
- ㉔ 赵玉明、王福顺主编《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
- ㉕ 参见胡占凡《继往开来 开拓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体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2期。
- ㉖ 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226页。
- ㉗ 赵玉明《谈谈广播电视研究和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 ㉘ 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 ㉙ 杨伟光《中国电视论纲》,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 ㉚ 李幸、汪继芳《西方纪录电影与中国电视》,《电视艺术》,1998年第3期。
- ㉛ 全套丛书共9本,分别是《中央电视台发展史》《电视专题文集》《电视新闻文集》《电视文艺文集》《重大新闻现场直播文案选编》《电视管理文集》《电视技术文集》《荧屏金杯录(二)》《中国电视美术》。
- ㉜ 详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中国电视论纲〉研讨会发言摘要》,《电视研究》,1999年第1期。
- ㉝ 陈力丹《构架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学——读〈中国电视论纲〉》,《电视研究》,1998年第11期。
- ㉞ 胡智锋、张国涛《两种路径 多元格局——十年来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科建设回眸》,《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
- ㉟ 石长顺《广播电视学:作为学科的内涵与知识体系》,《现代传播》,2013年第7期。
- ㊱ 欧阳宏生、李宜瑾《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
- ㊲ 欧阳宏生《理念、范式、方法——传媒研究方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

(作者欧阳宏生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大学特聘教授、传媒研究院院长;唐希牧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国涛】